

试论中国境内出土的下颌托

霍 巍 庞 政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成都 610064)

目 次

- 一 绪言
- 二 中国境内出土的下颌托
- 三 中国内地出土下颌托的三种类型
- 四 西方出土下颌托及其与中国境内出土下颌托的关系
- 五 中国境内出土下颌托的发展与演变
- 六 中国境内出土下颌托的性质
- 七 余论

一 绪 言

目前中国境内发现的下颌托共约百件,分布在全国多个地区,以纺织品和金属为主,流传时间甚长,从公元前十七世纪一直延续至明代。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关中地区的墓葬中已经发现下颌托,但此时并未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只是确定此物出土时附在死者下颌处,推测其作用为固定死者下颌〔1〕。二十一世纪初,大同南郊北魏墓群中一批下颌托的出土,学者开始关注下颌托的相关问题〔2〕。近年来,随着三峡地区唐宋墓葬、伊和淖尔北魏墓和吐尔基山辽墓等一批墓葬中下颌托的出土,学者展开了对此类遗物的梳理,就其形制、用途和源流等问题进行探讨,对下颌托与中国古代葬俗以及其所代表的宗教信仰、族属等问题有了进一步认识。宋馨认为,下颌托是一种固定死者下颌的遗物,并注意到北魏下颌托中有中亚金属工艺,提出使用下颌托的习俗并非汉地传统的看法,认为欧洲及中亚地区出土的下颌托与中国出土

〔1〕 张正岭:《西安韩森寨唐墓清理记》,《考古通讯》1957年第5期。

〔2〕 王银田、王雁卿:《大同南郊北魏墓群 M107 发掘报告》,《北朝研究》第一辑,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年;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博物馆:《大同南郊北魏墓群》,科学出版社,2006年。

的下颌托分属两个不同的系统^{〔1〕}。吴小平等学者通过对三峡地区唐宋墓葬中出土下颌托的梳理,将范围扩大到全国,提出中国出土的下颌托其源头在古希腊地区,流传路线为“从新疆到大同,然后到两京,最后到三峡和南方地区”,推测“其传播应当是随着最初使用这种器具的人群的迁徙才发生的”,还进而论证下颌托的使用是为了防止下颌脱落,推测其与萨满教灵魂不灭观有关,“承担着与丧葬面具相同的角色”^{〔2〕}。也有学者持与之类似的观点^{〔3〕}。冯恩学提出下颌托是受祆教文化影响的产物,是从祭司口罩转化而来,为祆教文化遗物,其在我国的出现与粟特人入华有关^{〔4〕}。这一观点既有学者赞同^{〔5〕},也有学者表示质疑^{〔6〕}。近来还有学者提出下颌托是中国传统丧葬礼仪衣尸的组成部分,与传统的覆面、手握和饭含关系密切,认为下颌托的作用是为了使填满饭含的口能够紧闭^{〔7〕}。综上所述,这些研究都有一定的价值,但也存在着进一步探索的空间,本文拟在更为全面收集中国境内出土下颌托考古资料的基础上展开讨论,提出一些新的认识,期望学术界仁人的指正批评。

二 中国境内出土的下颌托

下颌托在中国境内的分布十分广泛,按材质可分为纺织品和金属两大类,前者均出土于新疆地区,后者则全部发现于我国内地,新疆地区目前尚未发现金属质地的下颌托。基于下颌托材质的不同,现将相关出土材料分为新疆和内地两个地区,并按照时间早晚加以介绍。

(一)新疆地区出土的下颌托

新疆地区出土的下颌托主要在若羌小河、且末扎滚鲁克、和田山普拉、尉犁营盘、民丰尼雅及和田伊玛目·木沙·卡兹木麻扎墓地等。

若羌小河 M34,墓主为男性,由人骨的头颅、两臂和木制的躯干、下肢组合而成,墓主头颅

〔1〕 Shing Müller, Chin-straps of the Early Northern Wei: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Trans-Asiatic Diffusion of Funerary Practices, *Journal of East Asian Archaeology* 5, 2006; 宋馨:《中国境内金属下颌托的源流与演变——兼谈下颌托与流寓中国粟特人的关系》,《粟特人在中国——考古发现与出土文献的新印证》,科学出版社,2016年。

〔2〕 吴小平、崔本信:《三峡地区唐宋墓出土下颌托考》,《考古》2010年第8期;吴小平:《论我国境内出土的下颌托》,《考古》2013年第8期。

〔3〕 付承章:《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下颌托问题初探》,《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7期。

〔4〕 冯恩学:《下颌托——一个被忽视的祆教文化遗物》,《考古》2011年第2期。

〔5〕 王春燕、佰嘎力:《内蒙伊和卓北魏下颌托的前世今生》,《中国文物报》2014年8月15日6版;王春燕:《关于吐尔基山辽墓下颌托的一点思考》,《北方文物》2014年第2期。

〔6〕 吴小平:《论我国境内出土的下颌托》,《考古》2013年第8期;付承章:《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下颌托问题初探》,《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7期;王银田、王亮:《再议“下颌托”》,《暨南史学》第九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王银田:《下颌托与祆教无关》,《中国文物报》2014年10月24日6版;宋馨:《中国境内金属下颌托的源流与演变——兼谈下颌托与流寓中国粟特人的关系》,《粟特人在中国——考古发现与出土文献的新印证》,科学出版社,2016年。

〔7〕 王维坤、赵今:《再论我国境内出土下颌托的性质及其来源——兼与冯恩学、吴小平二位先生商榷》,《两个世界的徘徊——中古时期丧葬观念风俗与礼仪制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6年。

颞骨与下颌、下颌至头顶用毛线拴联固定(图一)。这种使用毛线固定死者下颌骨的做法,系迄今为止所见最早的下颌托,虽然形态简单,拴联固定下颌骨方式与后世下颌托也略有区别,但其功能已经具有固定死者下颌骨的作用,应是原始形态的下颌托。墓葬时代为公元前 1650—前 1450 年〔1〕。

且末扎滚鲁克 85M2,葬有一男三女,其中一男一女的人骨保存较好,二人下颌均用一根红色毛线绳系扎至头顶(图二,1),时代约为公元前 800 年〔2〕。且末扎滚鲁克 89M2,出土四具干尸,其中一具为小男孩,男孩颌下有一宽约 1 厘米的土黄色羊毛编织带,经两颊至头顶挽结,时代与 85M2 基本同时〔3〕。



图一 若羌小河 M34
出土毛线下颌托

和田山普拉 84LS I M01、84LS I M24、84LS I M49,出土二十四件下颌托,其中毛织物五件,丝织物十九件,此墓地出土的下颌托是由系带和托部组成,托部呈椭圆形或方形,有的托部中间还有开口(图二,2)。使用者为成年男性和女性墓主。M01 时代为公元前一世纪至公元一世纪,M24 和 M49 时代为公元前一世纪至公元二世纪〔4〕。

尉犁营盘 95M15,墓主为男性,下颌用淡黄色绢带托紧并在头顶系扎,面部罩有麻质面具,面具上绘出五官,前额位置贴饰长条形金箔片。尉犁营盘 95M26,墓主为成年女性,前额与下颌处各系有一条绢带。尉犁营盘 95M18,墓主为一幼儿,与尉犁营盘 95M26 情况类似。尉犁营盘 95M19,墓主为一成年男性,下颌处系有绢带。尉犁营盘 95M14,墓主为女性,下颌系有绢带。尉犁营盘 99M8,葬有一成年男性和一女性,男性额部束一红绢带,带上缝缀数枚圆形铜片,下颌束有绢带,女性墓主情况与之类似。此外,尉犁营盘 99M6、尉犁营盘 99M13 和尉犁营盘 99M59 情况与尉犁营盘 99M8 相似,男女墓主均在额部和下颌系一绢带,有些额带上还缀有金属片饰。多数墓主与下颌托同出的还有织物覆面和鼻塞。此墓地时代为东汉魏晋时期〔5〕。

民丰尼雅 95MN I M5,墓主为青年女性,一黄色绢带将下颌托住并系于头顶。民丰尼雅 95MN I M8,葬有男女各一人,男性墓主下颌系素绢带,托部由两条绢带构成,以便更好地托住下颌(图二,3)。民丰尼雅 97MN I M2,墓主为男性,下颌托的形制和民丰尼雅 95MN I M8 相似。民丰尼雅 95MN I M4,男性墓主下颌处用布带兜住并结于头顶。95MN I M6,墓主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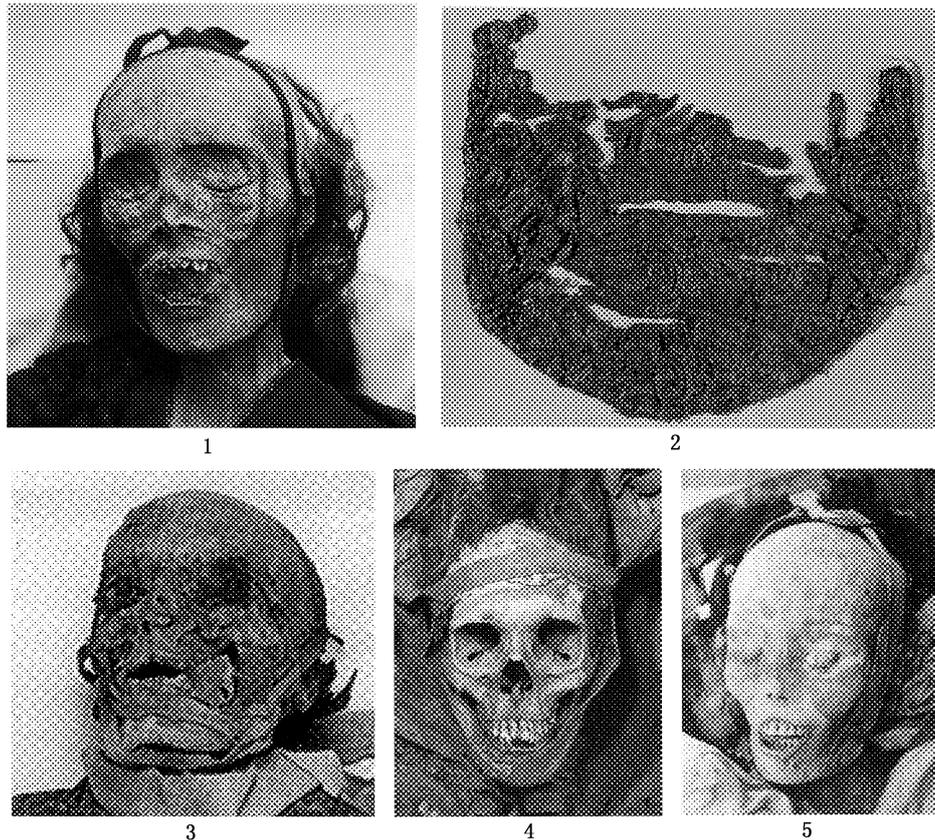
〔1〕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罗布泊小河墓地 2003 年发掘简报》,《文物》2007 年第 10 期。

〔2〕 新疆博物馆文物队:《且末县扎滚鲁克五座墓葬发掘简报》,《新疆文物》1998 年第 3 期。

〔3〕 巴音格楞蒙古自治州文管所:《且末县扎洪鲁克古墓 1989 年清理简报》,《新疆文物》1992 年第 2 期。

〔4〕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新疆山普拉——古代于阗文明的揭示与研究》,43 页,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 年。

〔5〕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尉犁县营盘墓地 15 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99 年第 1 期;《新疆尉犁县营盘墓地 1995 年发掘简报》,《文物》2002 年第 6 期;《新疆尉犁县营盘墓地 1999 年发掘简报》,《考古》2002 年第 6 期。



图二 出土下颌托

1. 且末扎滚鲁克 85M2 出土 2. 和田山普拉 M01 出土 3. 民丰尼雅 95MN I M8 出土 4. 民丰尼雅 95MN I M6 出土 5. 和田伊玛目·木沙·卡兹木麻扎 83HBYM1 出土 (1.毛质,2.材质不明,3—5.绢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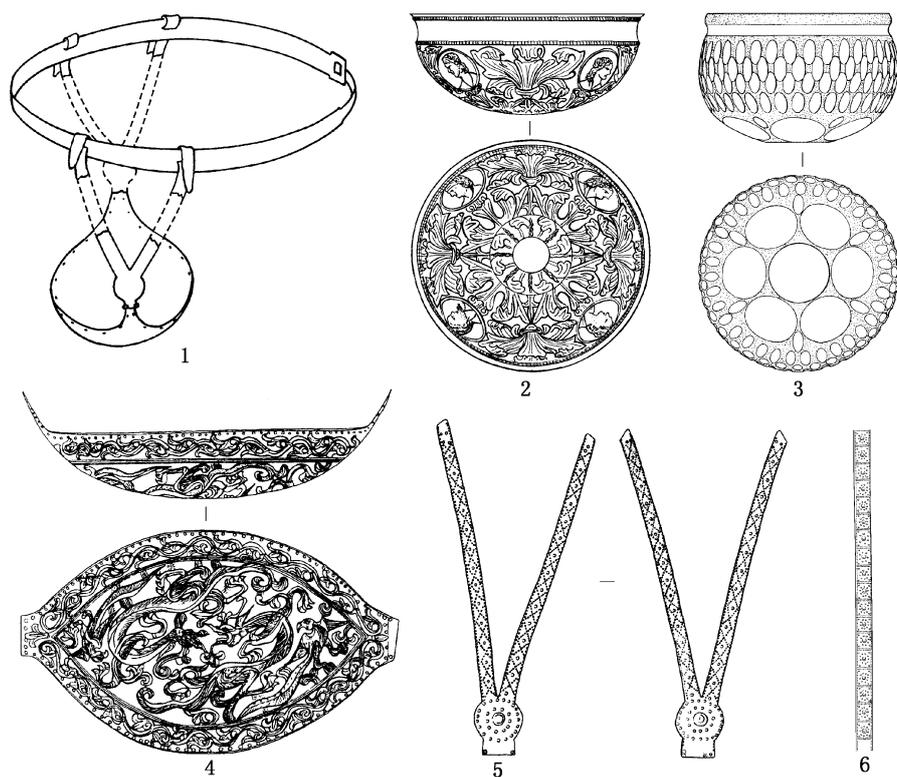
成年女性,下颌和额部均有系带(图二,4)。有的墓主面部和胸部覆盖有织物覆面。此墓地时代为东汉魏晋时期〔1〕。

和田伊玛目·木沙·卡兹木麻扎 82HBYM1、83HBYM1 和 84HBYM1,墓主分别为一女童、中年女性和老年男性,墓主均沿头顶至下颌用白绢带系扎(图二,5),与早期的下颌托有相同的功能。此墓地的时代为盛唐至五代时期〔2〕。综上所述,得到以下的认识。

第一,新疆地区使用下颌托的习俗起源早,延续时间长,从公元前十七世纪至唐末五代都有发现,但在且末扎滚鲁克墓地出土下颌托之后的近七个世纪,新疆境内没有下颌托的踪迹,直到公元前一世纪,下颌托才又再次现身于山普拉墓地。因此新疆地区的下颌托似又可分为

〔1〕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95年民丰尼雅遗址I号墓地船棺墓发掘简报》,《新疆文物》1998年第2期;《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95MN I号墓地M8发掘简报》,《文物》2000年第1期;《尼雅95墓地4号墓发掘简报》,《新疆文物》1999年第2期;中日共同尼雅遗迹学术考察队:《中日共同尼雅遗迹学术调查报告书》第二卷,中村印刷株式会社,1999年。

〔2〕 李吟屏:《新疆和田出土彩棺及其相关问题》,《考古与文物》2002年汉唐考古增刊。



图三 出土遗物

1. 铜下颌托(大同南郊北魏墓群 M107 出土) 2. 鎏金印花银碗(大同南郊北魏墓群 M107 出土) 3. 磨花玻璃碗(大同南郊北魏墓群 M107 出土) 4. 金下颌托的托部(伊和淖尔 M1 出土) 5. 金“V”形系带(伊和淖尔 M1 出土) 6. 金额带(伊和淖尔 M1 出土)

前后两个时期。从形制上看,最早出现的下颌托只是毛线或织带制成,最直接地反映出下颌托在丧葬仪式中的功能,与保护死者遗骸完整的丧葬观念有着密切关系。公元前一世纪山普拉墓地出土的下颌托,形制和组合使用情况已有变化,主要体现为系带之外独立托部的出现,有的托部中间还有开口(托部为两条绢带),并且与额带开始组合使用(额带贴金箔或缀金属片饰,但二者没有连接成一体)。这些变化在和田山普拉墓地、尉犁营盘墓地及民丰尼雅墓地中都有明显的体现。

第二,新疆地区出土下颌托最突出的特点是纺织品,与内地魏晋之后出土的金属下颌托形成对比。从使用下颌托墓主的性别分析,并无特殊限制,在当地应是一种较普遍的习俗。

第三,在东汉魏晋时期的一些墓葬中,与下颌托伴出的还有织物覆面和鼻塞,有的墓主面部和胸部均覆盖有织物的覆面。这个现象可能表明中原从商周以来流行的以覆面、含塞物为象征的丧葬礼俗已经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到西域,与新疆本地使用下颌托的丧葬习俗融为一体。

(二)内地出土的下颌托

内地出土的下颌托均为金属质^{〔1〕},于北魏时期开始出现,时间可与新疆地区出土的下颌托流行的晚段相衔接,大量出现于北朝和唐代,就目前情况看,使用时间的下限是明代,分布范围较广阔。

1. 北魏至隋末唐初 主要出土于大同、伊和淖尔和固原。

大同南郊北魏墓群 M107,墓主为女性^{〔2〕},出土一件铜下颌托,由环形额带、“V”形系带和舟形托部构成,三者相连为一个整体(图三,1)。额带和下颌托内外均残留有丝织品,或用于装饰下颌托。系带的合页工艺据研究应来自中亚一带^{〔3〕},与墓葬中出土鎏金鍍花银碗和磨花玻璃碗等具有浓厚西方文化色彩的器物具有相同的文化背景(图三,2、3)。类似的合页构造在北魏时期的内地下颌托中较为常见,同墓地 M109 和 M214 的情况与 M107 类似。其中 M109 墓主为女性,墓中也出土了一件鎏金鍍花高足银杯。这三座墓葬的时代为北魏平城时期^{〔4〕}。

在距大同不远的伊和淖尔 M1 和 M3 的北魏墓葬中各出土了一件与大同南郊 M107 出土



图四 伊和淖尔 M3 出土
鎏金下颌托与额带

者相近的下颌托,下颌托均由额带、“V”形系带和托部构成,三者相连为整体,系带下端有合页构造,为鎏金铜或金质,器身表面有精美的纹饰,托部镶嵌有宝石(图三,4—6;图四)。M1 出土的鎏金鍍花银碗与大同南郊北魏墓群出土者相近,具有浓厚的西方文化色彩。M1 出土了大量的金饰品,墓葬年代约为五世纪晚期。2014 年发掘的 M3 墓主为女性^{〔5〕}。

大同阳高尉迟定州墓,墓主为女性,铜下颌托,形制与大同南郊北魏 M107 类似。时代为公元 457 年^{〔6〕}。

西安邵真墓,墓主为男性,银下颌托与额带组合使用,两者相连为一体。时代为公元 520 年^{〔7〕}。

此外,比利时和瑞士私人收藏的两件金下颌托,其形制、

〔1〕 由于其为金属,一些下颌托的保存状况较差,其形制和使用方式无法得知,本文对于这部分材料暂不涉及。这部分材料共十一件,包括大同南郊北魏墓群的九件(M24、M35、M53、M87、M116、M170、M208、M211、M239),大同迎宾大道北魏墓 M37 与河南偃师北魏墓 YDII M926 各一件。这些下颌托多为铜质,也有铅质和银质。已知墓主性别者均为女性。参见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博物馆:《大同南郊北魏墓群》,科学出版社,2006 年;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迎宾大道北魏墓群》,《文物》2006 年第 10 期;王竹林:《河南偃师南蔡庄杏园村的四座北魏墓》,《考古》1991 年第 9 期。

〔2〕 据墓中出土的头簪与剪刀推测墓主为女性。

〔3〕 宋馨:《中国境内金属下颌托的源流与演变——兼谈下颌托与流寓中国粟特人的关系》,《粟特人在中国——考古发现与出土文献的新印证》,510 页,科学出版社,2016 年。

〔4〕 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博物馆:《大同南郊北魏墓群》,科学出版社,2006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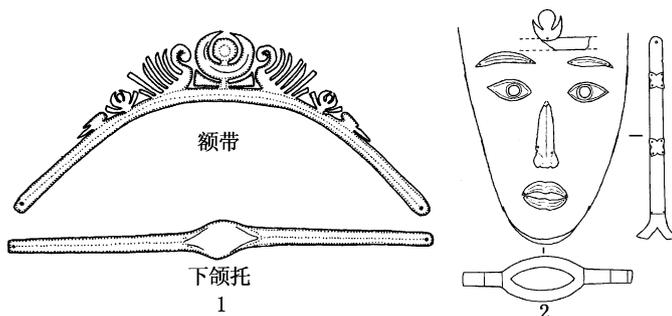
〔5〕 王春燕、佰嘎力:《内蒙伊和卓北魏下颌托的前世今生》,《中国文物报》2014 年 8 月 15 日 6 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锡林郭勒盟文物保护管理站、正镶白旗文物管理所:《内蒙古正镶白旗伊和淖尔 M1 发掘简报》,《文物》2017 年第 1 期。

〔6〕 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阳高北魏尉迟定州墓发掘简报》,《文物》2011 年第 12 期。

〔7〕 邹景璧:《西安任家口 M229 号北魏墓清理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5 年第 12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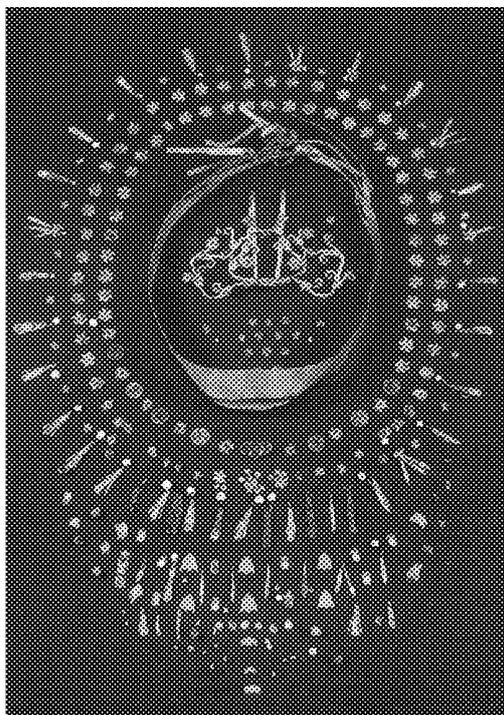
工艺和纹饰与前述北魏下颌托基本一致。时代为北魏平城时期〔1〕。

固原九龙山 2004YKJM33, 为男女双人葬, 女性无额带和下颌托, 男性墓主使用金下颌托与额带, 额带上日月、鸚鵡等图案, 额带与下颌托均饰有联珠纹。下颌托总长 40 厘米, 这样的长度无法使系带在头顶系结, 且系带两端有孔, 结合出土位置关系, 可知下颌托系带尾端应与额带相连, 二者相连为一体并组合使用



图五 出土遗物

1. 金额带与下颌托(固原九龙山 2004YKJM33 出土) 2. 金额带与下颌托(固原史道德墓出土)



图六 咸阳贺若厥墓出土金下颌托与冠饰

(图五,1)。时代为隋末唐初〔2〕。固原的一套征集品与之情况类似, 时代为唐代〔3〕。

固原史道德墓, 墓主为男性, 出土金额带与下颌托, 托部有开口, 额带上有日月等图案, 形制与九龙山 M33 相似, 二者相连为一体且组合使用(图五,2)。史道德生前任唐给事郎兰池正监, 是昭武九姓之后, 其先祖曾居西域, 后迁至固原。墓葬虽被盗, 仍出土了大量的金质物品, 且拥有七个天井, 可见墓主人身份地位比较高贵, 经济实力雄厚。时代为公元 678 年〔4〕。

2. 唐至明代 分为初唐至盛唐时期、唐中期至唐末五代时期、辽宋元明时期。

(1)初唐至盛唐时期 咸阳贺若厥墓, 墓主为女性, 出土一件金下颌托。墓中出土有华丽繁复的冠饰, 头冠由金圈、金花钿、金花叶、金花蕊、玉片、珍珠、宝石和丝绸等物组成, 可见其十分厚重。值得注意的是, 下颌托系带尾端分叉为四或五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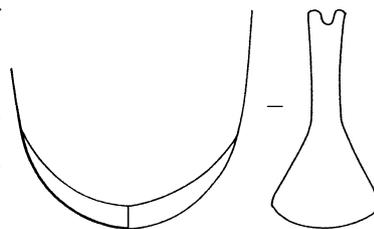
〔1〕 宋馨:《中国境内金属下颌托的源流与演变——兼谈下颌托与流寓中国粟特人的关系》,《粟特人在中国——考古发现与出土文献的新印证》,509 页,科学出版社,2016 年。

〔2〕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固原九龙山汉唐墓葬》,129 页,科学出版社,2012 年。

〔3〕 宁夏固原博物馆:《固原文物精品图集》下册,20 页,宁夏人民出版社,2013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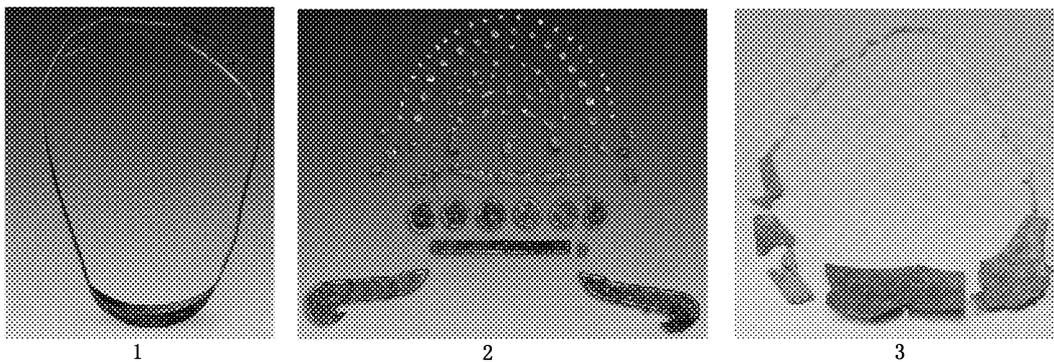
〔4〕 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地》,91 页,文物出版社,1996 年;宁夏固原博物馆:《宁夏固原唐史道德墓清理简报》,《文物》1985 年第 11 期。

且相互缠绕,显然其目的并非是单为固定下颌所用,而应同时适应固定十分厚重冠饰的需要,可见下颌托与冠饰连为一体,二者组合使用(图六)。墓主为北周柱国大将军独孤信之儿媳,大姐为北周明帝皇后,四姐为李渊父之妻,七妹为隋文帝皇后,贺若氏属于鲜卑北地代人中的一支。时代为公元 621 年〔1〕。



图七 郟县阎婉墓出土银下颌托

郟县阎婉墓,墓主为女性,出土一件银下颌托。下颌托系



图八 出土遗物

1. 银下颌托(阎识微夫妇墓出土) 2. 头冠饰(阎识微夫妇墓出土) 3. 鎏金铜下颌托(金乡县主墓出土)

带两端分叉为“V”形,与北魏时期的系带形制十分相似,而墓中出土了大量的铜丝、铜花、琉璃珠等头冠构件(图七)。结合前述可知下颌托应与厚重繁复的头冠相连为一体,组合使用。墓主为阎立德之女,李泰之妻,祖辈在北朝均任高官。时代为公元 690 年〔2〕。

西安阎识微与夫人裴氏合葬墓,男墓主没有佩戴下颌托,而女墓主裴氏使用了一件银下颌托,系带两端残断。墓中出土裴氏佩戴的头冠一套,冠饰十分复杂,主要材质为鎏金铜,此外还有宝石、玻璃、珍珠和羽毛等。冠饰中一长条形带上残留有两截铜丝,铜丝与带子系结相连,通过比较可知,铜丝应是下颌托系带的两端,下颌托应与冠饰相连(图八,1、2)。裴氏之夫为阎立德之孙,生前任唐太州司马,加朝议大夫。裴氏为河东闻喜人,祖辈在隋唐两朝任中高级官员,其父为万年县令裴重晖,其母为新野县主李令。墓中随葬品十分丰富,结合墓主家庭背景可知其身份地位高贵,与皇室存在血缘关系,家境殷实。时代为公元 691 年〔3〕。

西安于隐及其夫人金乡县主合葬墓,男墓主没有使用下颌托,而女墓主有一鎏金铜下颌托。墓中出土大量的头冠饰件,其上多镶嵌各色宝石(图八,3),此外头冠构件还有牙雕、玻璃花和琉璃珠等,由于被盗和残断,已不知原来的整体结构。就目前出土情况推想,这些饰件组成的头

〔1〕 安志:《陕西长安县南里王村与咸阳飞机场出土大量隋唐珍贵文物》,《考古与文物》1993 年第 6 期;姚薇元:《北朝胡姓考》,94、95 页,中华书局,1962 年。

〔2〕 湖北省博物馆、郟县博物馆:《湖北郟县唐李微、阎婉墓发掘简报》,《文物》1987 年第 8 期。

〔3〕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西安马家沟唐太州司马阎识微夫妇墓发掘简报》,《文物》2014 年第 10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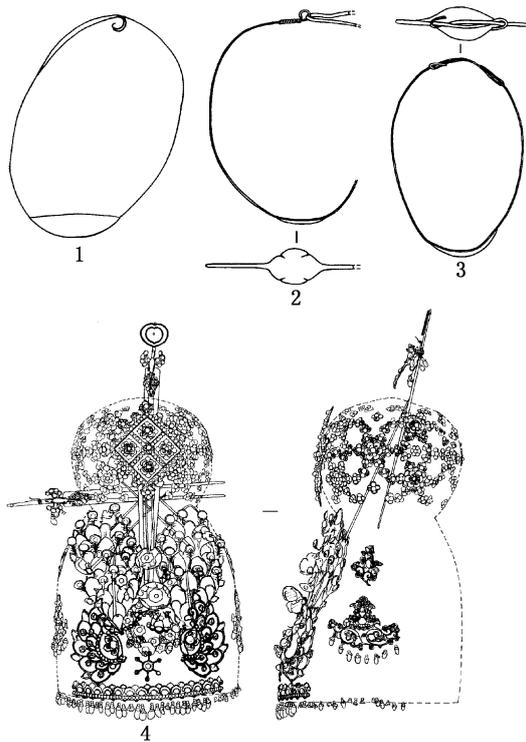
冠繁复华丽，而下颌托与冠饰应当成套使用。金乡县主为李渊孙女。时代为公元 722 年〔1〕。

西安南寨子村张氏墓，出土一件银下颌托，呈椭圆形环状，环径 13.8—20.4 厘米(图九,1)。系带虽然闭合呈环状，但两条系带并未挽结，且左侧系带尾端呈弯钩状，这种形制与后文重庆巫山江东嘴 II M5 女性墓主佩戴的下颌托相似。这样的下颌托原本也应与冠帽相连〔2〕。张氏葬于公元 733 年〔3〕。

西安李_倕墓，出土一件银下颌托，下颌托仅存托部。墓中出土一套头冠，冠饰内衬的织物及其他有机物已腐朽无存，考古部门对遗留的构件打包提取，随后进行清理及修复，复原的头冠复杂又艳丽。根据报告可知，头冠由金银、贝壳、象牙、玻璃、珍珠、宝石、丝绸和二十八个微雕等饰件组成，这样繁复的头冠应是十分沉重，而下颌托的作用同样不只是用以固定死者的下颌骨，而同时也应当起到固定冠饰的作用(图九,4)。李_倕为李渊五代孙女，其夫为北魏贵族侯莫陈氏，卒于公元 736 年〔4〕。

西安韩森寨宋氏墓，出土一件金下颌托，系带分叉为两支，分叉处靠近托部，系带的大部分由两条金带构成，这样的形制与前述北魏时期流行的“V”形系带相似。此构造应不只是固定下颌骨，结合墓主头部出土的金笄、金银花饰和金球等冠饰，可知下颌托应与冠饰相连，分叉的系带可以更好地固定冠饰。宋氏为内侍雷府君夫人，雷时为内侍省之长。时代为公元 745 年〔5〕。与此墓情况类似的有洛阳卢氏墓〔6〕，卢氏为唐中散大夫、景城别驾卢廷芳之女。时代为公元 750 年。

(2)唐中期至唐末五代时期 偃师杏园 M5036,男女墓主各佩戴一件铜下颌托,全长 15



图九 出土遗物

1. 银下颌托(南寨子村张氏墓出土) 2. 铜下颌托(奉节上关 M34 出土) 3. 银下颌托(巴东雷家坪 M1 出土)
4. 头冠(李_倕墓出土)

〔1〕 王自力、孙福喜：《唐金乡县主墓》，76—80 页，文物出版社，2002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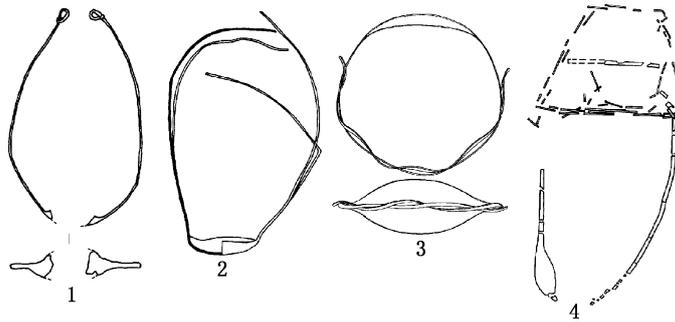
〔2〕 据墓志可知，其祖父为银青光禄大夫、陇州刺史，其父时任职于蜀，但其官职和名讳在墓志中并未提及。志文对张氏女谈论较少，仅有“聪明仁孝”四字，但对张氏之母充满了溢美之词，并阐述了其母的家室渊源。由墓志可知张氏之母为河南元氏，元氏的祖父讳大士，为西台侍郎，父讳庭，为太原府法曹。河南元氏，原属鲜卑拓跋部的一支。张氏卒是因母亲去世后“哀毁过礼，久而成疾，遂告云亡”，卒年十七岁。出现张氏墓这样情况的原因或与其家道中落和年幼夭折有关，这也可以从墓葬的规模等级与随葬品体现出来。

〔3〕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西安东郊唐代张夫人墓发掘简报》，《文博》2013 年第 1 期。

〔4〕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唐李_倕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5 年第 6 期。

〔5〕 张正岭：《西安韩森寨唐墓清理记》，《考古通讯》1957 年第 5 期。

〔6〕 洛阳博物馆：《洛阳关林唐墓》，《考古》1980 年第 4 期。



图一〇 出土遗物

1. 铜下颌托(奉节宝塔坪 2000 I M1010 出土) 2、3. 银下颌托(洛阳东明小区 C5M1542 出土、成都前蜀王建墓出土) 4. 银下颌托与头饰(秭归庙坪 M90 出土)

厘米,可插接于冠帽两侧。二人于公元 778 年下葬^[1]。偃师杏园 M5109 郑夫人墓和偃师杏园 YHM3 窦承家夫妇墓分别出土一件下颌托,形制与 M5036 相似,墓葬时代分别为公元 754 和公元 756 年。上述墓主人身份均为中下层官吏^[2]。

奉节上关 M34,出土一件铜下颌托,系带一端有环,另一端穿入环中在头顶结扎,长径 21.2 厘米

(图九,2)。同墓地 M44 与之类似。两墓时代均为唐中期^[3]。

巴东雷家坪 M1,墓主为男性,出土一件银下颌托,呈椭圆形,系带在头顶打结,通高 26.4 厘米(图九,3)。墓葬时代为唐中期^[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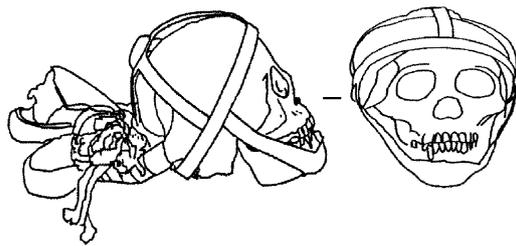
巫山江东嘴 II M5,墓主为女性,出土一件银下颌托,右侧系带的尾端向外形成弯钩,器高 20.5 厘米。可推断系带应在额部的位置与它物相连,可能与其连接之物就是冠帽。墓葬的发掘者也认为是冠帽的构架。墓葬时代为唐中期^[5]。

奉节宝塔坪 2000 I M1010,出土一件铜下颌托,系带两端有环,全长 36.4 厘米。这样的长度无法在头顶打结,结合前述情况,应是通过系带两端的环与冠饰结合(图一〇,1)。墓葬时代为唐中晚期^[6]。

奉节宝塔坪 2001 I M1006,墓主为男性,出土一件乌银下颌托,该器绕耳后,在颅顶绕一小环,托部呈勺状。墓葬时代为唐晚期^[7]。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河南偃师市杏园村唐墓的发掘》,《考古》1996 年第 12 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杏园唐墓》,98、135 页,科学出版社,2001 年。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杏园唐墓》,97、106、107、135 页,科学出版社,2001 年。
 [3] 重庆市文物考古所:《奉节上关遗址发掘简报》,《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8 卷》,292 页,科学出版社,2003 年;吴小平、崔本信:《三峡地区唐宋墓出土下颌托考》,《考古》2010 年第 8 期。
 [4] 湖北省荆州博物馆:《巴东县雷家坪遗址 2003 年发掘报告》,《湖北库区考古报告集》第四卷,42、91、92 页,科学出版社,2007 年;吴小平、崔本信:《三峡地区唐宋墓出土下颌托考》,《考古》2010 年第 8 期。
 [5] 南京大学历史系、重庆市文物局、巫山县文物管理所:《巫山江东嘴遗址发掘报告》,《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1 卷》上册,97、98 页,科学出版社,2007 年;吴小平、崔本信:《三峡地区唐宋墓出土下颌托考》,《考古》2010 年第 8 期。
 [6] 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奉节宝塔坪》,30、31 页,科学出版社,2010 年(经笔者测量报告所附的下颌托线图,可知报告所谓下颌托“单侧长 36.4 厘米”应是“全长 36.4 厘米”的笔误);吴小平、崔本信:《三峡地区唐宋墓出土下颌托考》,《考古》2010 年第 8 期。
 [7]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重庆市文物局、奉节县白帝城文物管理所:《奉节宝塔坪 2001 年唐宋明清墓发掘报告》,《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1 卷》上册,440 页,科学出版社,2007 年。

洛阳东明小区 C5M1542, 男女墓主各佩戴一件银下颌托, 形制与前述西安韩森寨宋氏墓相近(图一〇, 2)。女性墓主头部附近有大量松石饰件、金丝和银饰件, 可能为冠饰。男墓主为高秀峰, 大历中特受朝散郎, 试左青道率府兵曹参军, 夫人为陇西李氏。墓葬时代为公元 826 年〔1〕。



图一— 金下颌托(通辽吐尔基山辽墓出土)

偃师杏园 M2003, 墓主为韦河夫妇, 出土一件铜下颌托, 使用者不明。报告称下颌托“两侧长条形, 长 26.7 厘米”。这样的长度无法在头顶打结, 或应与冠帽相连组合使用。墓主下葬于公元 829 年〔2〕。偃师杏园唐墓中的 M1819 为李归厚夫妇合葬墓, M0954 为单人葬, 两墓各出土一件铜下颌托, 形制与 M2003 相似。M1819 中的下颌托使用者不明。根据 M0954 中尸体旁出土的粉盒和剪刀推测墓主应是女性。M1819 李归厚之妻葬于公元 858 年, M0954 为唐晚期〔3〕。

广州皇帝岗唐墓, 墓主为女性, 出土一件鎏金银下颌托, 与下颌托同出有钗饰和花牌饰, 三者的出土位置均在头部, 彼此相邻。墓葬时代为唐末〔4〕。

成都前蜀王建墓, 出土一件银下颌托, 两条系带相互缠绕, 通高 17 厘米(图一〇, 3), 形制特殊〔5〕。王建葬于公元 918 年〔6〕。

(3) 辽宋元明时期 通辽吐尔基山辽墓, 墓主为女性, 头戴棉帽, 帽内为“十”字梁金帽圈, 金下颌托, 托部为船形, 两侧长条片向上延伸与帽圈相连, 其中一侧与帽圈铆接, 另一侧附带缠扣, 可随意开合。器身刻有花纹, 出土时位于头骨下颌处(图一一)。墓葬时代为辽代早期〔7〕。

秭归庙坪 M90, 出土一件银下颌托, 与梯形头饰相连(图一〇, 4), 墓葬时代为北宋中期〔8〕。M37 和 M38 与 M90 情况相似, 两位墓主均佩戴一件与头饰相连的下颌托。墓葬时代分别为北宋中期和北宋晚期〔9〕。

耒阳 M60, 出土一件银下颌托, 单侧系带长 16 厘米, 两端有环, 形制与前述重庆奉节宝塔

〔1〕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市东明小区 C5M1542 唐墓》,《文物》2004 年第 7 期。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杏园唐墓》,168、209 页,科学出版社,2001 年。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杏园唐墓》,172、175、185 页,科学出版社,2001 年。

〔4〕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皇帝岗唐木椁墓清理简报》,《考古通讯》1959 年第 12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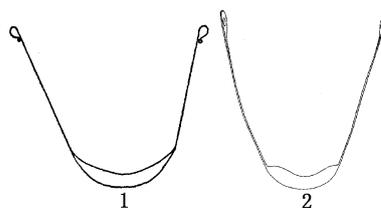
〔5〕 系带相互缠绕的形制只此一例,且通高 17 厘米,此高度应该无法佩戴在死者头部,这些情况可能是由墓葬被盗所致。

〔6〕 冯汉骥:《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58、59 页,文物出版社,2002 年。

〔7〕 王春燕:《关于吐尔基山辽墓金下颌托的一点思考》,《北方文物》2014 年第 2 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通辽市吐尔基山辽代墓葬》,《考古》2004 年第 7 期。

〔8〕 湖北省文物事业管理局、湖北省三峡工程移民局:《秭归庙坪——长江三峡工程文物保护项目报告》,210 页,科学出版社,2003 年;吴小平、崔本信:《三峡地区唐宋墓出土下颌托考》,《考古》2010 年第 8 期。

〔9〕 湖北省文物事业管理局、湖北省三峡工程移民局:《秭归庙坪——长江三峡工程文物保护项目报告》,193、201 页,科学出版社,2003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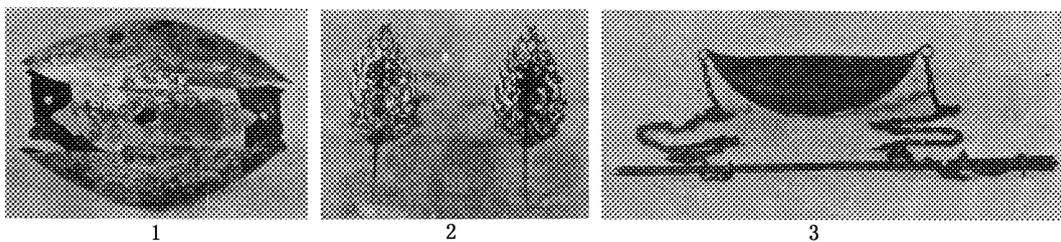
图一二 出土遗物

1. 银下颌托(耒阳 M60 出土) 2. 铜下颌托(秭归老坟园 M22 出土)

坪 M1010 相近,这样的长度无法在头顶打结,结合前述情况,应与冠帽相连组合使用(图一二,1)。同墓地 M277 出土了一件形制与 M60 类似的银下颌托。两墓的时代均为北宋晚期〔1〕。

此外,衡阳北宋末期墓〔2〕和秭归老坟园 M22〔3〕中各出土一件铜下颌托(图一二,2),形制与耒阳 M60 出土者相近。

德安周氏墓,墓主为女性,出土一件银下颌托,两端有穿,置于头骨下颌处,长约 15 厘米。形制与前述耒阳 M60 等墓出土者十分相近,且墓主戴头冠,下颌托原本应与头冠相连组合使用。周氏为南宋新太平州通判吴畴之妻。墓葬时代为 1274 年〔4〕。



图一三 安庆范文虎夫妇合葬墓出土遗物

1. 金头冠 2. 金花 3. 银下颌托

安庆范文虎和陈氏夫妇合葬墓,仅陈氏有一件银下颌托,链子状系带与一横杠相连,同出有金冠和金花等饰件,这些饰件遗留有镶嵌痕迹,可能是头冠的附属物。金冠有孔,与下颌托相连的横杠可能原是插在冠上的或属于金冠的构件(图一三)。范文虎是南宋时殿前副都指挥使知安庆府,入元后历官至尚书省右丞,《元史》有传。墓葬时代为 1305 年〔5〕。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遵义、铜仁等地发现了六处十一件下颌托,以金质为主,还有银质和玉质,时代为十三世纪中期至十六世纪中期。这些下颌托可分三类。其一,杨氏第二十八世土司杨相(卒于 1544 年)夫妇墓出土一件白玉下颌托,由链状条带与托部组成,雕刻纹饰,条带末端为挂钩,与前述安徽安庆出土者相似。其二,下颌托由椭圆形托部和系带组成,系带末端弯曲为钩或环,长度无法在头顶打结,形制与湖南耒阳 M60 出土者类似,有些刻饰花纹,部分墓中还出土了金银冠饰,下颌托应与之组合使用。此类型共有八件,其中两件出土于杨氏第十四世土司杨价夫妇墓,杨价卒于 1243 年,夫人卒年略晚。其三,遵义和平乡和铜仁德江县

〔1〕 衡阳市文物工作队:《湖南耒阳城关六朝唐宋墓》,《考古学报》1996 年第 2 期。

〔2〕 湖南省博物馆、衡阳市博物馆:《衡阳县何家皂北宋墓》,《文物》1984 年第 12 期。

〔3〕 黑龙江文物考古研究所:《秭归老坟园墓群发掘报告》,《湖北库区考古报告集》第三卷,72 页,科学出版社,2006 年。

〔4〕 周迪人、周、杨明:《德安南宋周氏墓》,4、15、68 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 年。

〔5〕 白冠西:《安庆市棋盘山发现的元墓介绍》,《文物参考资料》1957 年第 5 期。

出土的两件下颌托形制相似，下颌托的系带在末端缠绕打结〔1〕。从形制和功能来看，贵州出土的明代下颌托与中晚唐以来的传统一脉相承，且使用者多为女性。部分墓葬中还伴出有黄金覆面。

纵观上述中国内地考古发掘出土的不同时期的下颌托，按照其使用方式和组合使用的情况，可以将其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与额带组合使用的下颌托；二是与头饰冠饰组合使用的下颌托；三是单独使用的下颌托。这三种不同类型的下颌托发现的年代、分布的地域、使用者的性别与家世均显示出不同的特点，应与各自不同的历史背景相关。下面对此细加分析。

三 中国内地出土下颌托的三种类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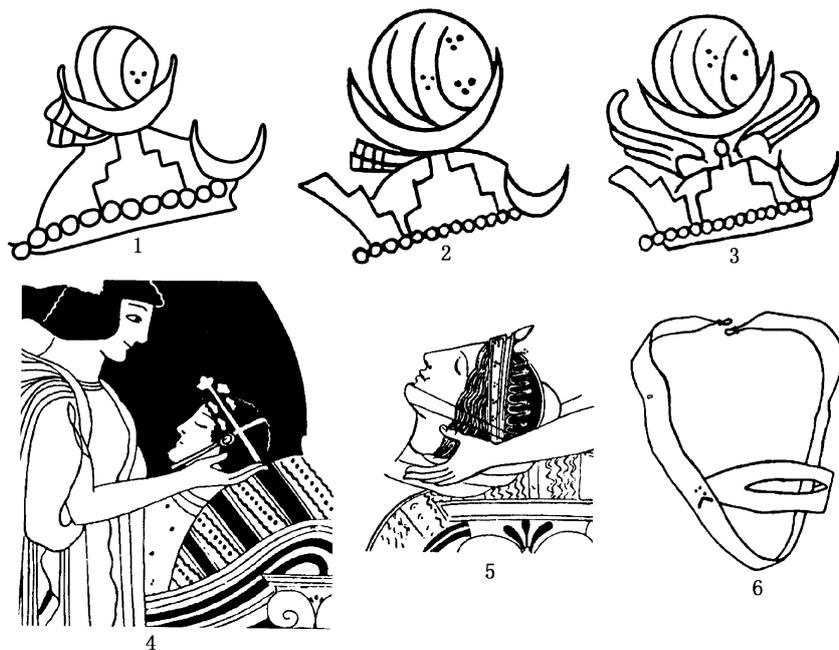
上述三种类型的下颌托各有流行时段和分布地域，其中与额带组合使用的下颌托流行时段主要为北魏至初唐时期，集中分布在大同、西安和固原等地。与头饰冠饰组合使用的下颌托则流行于唐初至明代，主要分布在唐两京地区、广州、三峡地区及长江中下游流域。单独使用的下颌托主要见于三峡地区的中晚唐墓葬和前蜀王建墓中。与额带和冠饰组合使用的下颌托无论从流行时间、分布地域还是出土数量上均占内地出土下颌托总量的多数，单独使用的下颌托数量极少，可见前两种类型是我国内地下颌托的主流，而且两者流行的时间也是前后相接的。

北魏至唐初的下颌托具有很高的相似性，可以视为下颌托在我国内地传播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显著特征是下颌托与额带相连为一个整体。连接方式有两种，“V”形系带和尾端穿孔。这一时期下颌托在时间上可以承接新疆地区，与前述新疆地区的下颌托相比，这一时期内地在新疆下颌托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并且接受了以发达的金属工艺（如合页技术）为主的中亚文化因素，使之与新疆地区形成了较大的差异。这些异同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为形制，两地下颌托均与额带组合使用，不同点在于内地的下颌托与额带相连为一个整体，而新疆地区二者互相独立；二为质地，内地不再延续新疆纺织品的传统，开始使用金属下颌托和额带，但北魏时期一些下颌托外缝缀有作为器身装饰的花纹织品，近乎是新疆纺织品传统的遗痕。

从墓志所反映的墓葬等级和随葬品看，这一时期下颌托的使用者身份较高，大同和内蒙古地区的墓主多为鲜卑贵族。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使用下颌托的墓主性别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已知的墓主性别，除固原的两位下颌托使用者为男性外，其余均为女性，且下颌托表面饰有精美的纹饰，加之墓葬中随葬了大量装饰品，体现出下颌托装饰性功能的不断强化。

仔细观察发现，固原地区出土时代为隋末初唐的与下颌托组合使用的额带，与北魏时期额

〔1〕 此前贵州发现的下颌托多未见有相关报道，近来有学者撰文对这批器物进行了较为集中而简略的介绍。参见李飞：《颜面——贵州出土的黄金覆面与下颌托（上）》，《当代贵州》2018年第37期；《颜面——贵州出土的黄金覆面与下颌托（下）》，《当代贵州》2018年第41期。



图一四 卑路斯王冠图案与西方的下颌托

1—3. 卑路斯王冠图案 4、5. 希腊陶祭瓶上绘制的下颌托图案 6. 雅典出土的金下颌托

带有所不同,主要体现在固原出土的额带上出现日、月、鸚鵡和联珠纹等图案,包括下颌托器身上也饰有联珠纹。这些变化使得固原出土的额带增添了几分头冠的元素,这一推测在同墓地出土的一枚萨珊波斯银币的图案中得到了印证。这枚银币属萨珊卑路斯王在位时期(公元459—484年),银币正面联珠纹边框中绘有萨珊王侧面肖像,其王冠中部与后部有齿状物,冠顶有羽翼状饰物,上为新月,新月托一圆日,与其他卑路斯朝银币图案基本一致,这也是卑路斯朝银币图案中王冠的共同特征^{〔1〕}(图一四,1—3)。通过与银币上王冠图纹的比较,可知固原出土的下颌托额带图案与卑路斯王王冠上的图案相似,显然这是受波斯萨珊文化影响的结果。从固原在南北朝隋唐时期作为西域与平城和中原之间交往联系的重要中转站这一点来看,这种联系是十分密切的,尤其是萨珊卑路斯王在位期间,曾四次遣使与北魏交往,这些使者便是经过固原前往首都平城的^{〔2〕}。因此,这一时期固原出土的下颌托额带上的图案受到萨珊王冠影响,开始出现了头冠的某些特征,似乎开启了后世下颌托配合头冠使用的先河。

第二种类型即与头饰冠饰组合使用的下颌托,出现时间上承前一种类型,可以视为下颌托在我国内地传播发展的第二个阶段。这个类型的下颌托最早出现在两京地区,中晚唐时向南传播到三峡地区,宋以后向长江中下游等地扩散。此种类型的下颌托一个最大的特征,即下颌

〔1〕 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地》,148—150页,文物出版社,1996年。

〔2〕 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地》,163—166页,文物出版社,1996年。

托与极具中国元素的头饰冠饰相连为一个整体。连接方式有两种，系带分叉和尾端有穿（环），系带分叉其实就是“V”形系带的一种变体，可见在形制上与前一阶段一脉相承。

在已知墓主性别的墓葬中，除衡阳、洛阳东明小区以及偃师杏园 M5036 这三座墓的下颌托使用者为男性外，其余均为女性，这再次表明下颌托在装饰性功能上的强化，也是下颌托在传入内地之后不断中国化的体现。结合墓志所反映的墓葬规格和随葬品看，唐以来使用下颌托者逐渐向社会各阶层扩散。初唐和盛唐时期的墓主，其自身与其家族身份高贵；若是女性死者，则其夫多为王室贵族和高级官员；墓主多与拓跋鲜卑存在亲缘血缘关系。这种情况在中晚唐时期开始发生改变，使用下颌托的墓主多为一些中下层官吏，与初唐和盛唐时期的使用者相比较，在社会地位、血缘关系等方面均差异明显。下颌托的功能，也逐渐发展成为与冠饰相结合的女性死者的专用物品，装饰性意味远强于保存死者下颌骨与遗骸完整的原始丧葬意味。

第三种类型即单独使用的下颌托，未发现与冠饰组合使用的情况。这主要集中发现在三峡地区的中晚唐时期墓葬中，发现数量少，使用者性别并无特殊限制，这些情况与早期新疆地区出土下颌托的情形较为相似。除前蜀王建之外，这一时期其他使用下颌托者的身份地位很低，有的或为中下层平民〔1〕。如何解释这一现象，我们认为很可能与三峡地区作为中晚唐时期长江沿线的过往通道这一特殊自然条件有关，死者的身份有可能是从西域经往长江的过客，所以还较多地保留着新疆地区使用下颌托的旧有习俗。

作为上述推论的一个旁证，可举奉节宝塔坪 2001 I M1006 出土的一件属于第三种类型的下颌托，据研究，在它的制作过程中运用了乌银工艺，这种工艺兴起于古罗马时期，盛行于波斯萨珊王朝时期，这也是我国境内首次发现乌银工艺的考古实例〔2〕。那么，西来的乌银工艺出现在三峡地区的下颌托中，很可能表明其传播的途径是由西域传到长江水道。那么，出现在三峡地区中晚唐墓葬、成都前蜀王建墓当中的这类与早期新疆出土者十分相似的下颌托，不排除其由西域新疆直接传播到成都地区，再由成都通过长江水道传播到三峡地区。

四 西方出土下颌托及其与中国境内出土下颌托的关系

下颌托不仅在中国境内有所发现，在西方考古文化中也有所发现，两者之间的关系值得作深入的比较研究，对于认识中国境内下颌托的源流、演变及其文化含义均有意义。

据相关资料和研究显示，公元前十二世纪至前八世纪即古希腊文化迈锡尼时期，已经在阿提卡与雅典地区墓葬中发现了金质和铅质下颌托，这一传统在公元前八世纪至前四世纪即古希腊文化的远古与古典时期依然存在，在同时期的阿提卡地区的墓葬中仍有出土。根据国外

〔1〕 重庆市文物考古所：《奉节上关遗址发掘简报》，《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8卷》，292页，科学出版社，2003年。

〔2〕 崔剑锋、刘爽、魏东、吴小红：《中国乌银工艺的首次发现和初步研究》，《边疆考古研究》第7辑，科学出版社，2008年。

学者研究,古希腊文化中大多数下颌托应属于纺织品类,这与新疆地区的情况类似。公元前六世纪至前五世纪的希腊陶祭瓶上绘制有哭丧仪式的图案,图中绘有死者使用下颌托的情况,下颌托为一布条,托住死者下颌在头顶系结〔1〕(图一四,4、5)。图中的死者头戴额带(头冠),下颌托与之组合使用,但是研究者注意到两者并没有连接在一起〔2〕,这一习俗无论是从下颌托的形制还是使用方式上来看,均与新疆营盘墓地额带与下颌托组合使用的情形相似。可见,前述新疆地区使用下颌托习俗的出现可能是受到西方文化因素的刺激与影响。此外,山普拉墓地出土有属毛织品的下颌托,有学者指出此墓地出土的毛织品使用了麻织工艺,可能来自葱岭以西或是西亚地区〔3〕,甚至是大秦〔4〕,这也可以作为新疆地区下颌托受西来文化影响的旁证。

由前述可知,目前最早的下颌托出现于公元前十七至前五世纪的新疆,就现有资料看,似乎比欧洲要早,但这并不能改变这一习俗系受到西方影响的基本认识。从考古材料看,欧亚之间的互动早在商周时期业已开始〔5〕,草原丝绸之路在这一时期形成,在欧亚大陆的广袤区域,众多民族生息繁衍,他们不断迁徙和交往〔6〕,新疆地区早期发现的下颌托在这样的背景下从西方传来的可能性较大,只是由于目前我们对西方古代文化中下颌托的相关资料还掌握不多,有待于作进一步考察,不排除将来有更早的西方出土资料来廓清两者之间的关系。

中亚地区的考古发掘中也看到下颌托的身影。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苏联考古工作者在今阿富汗北部席巴尔甘地区的墓葬中发现数件下颌托,墓葬的年代为公元前一世纪至公元一世纪。据研究,这批墓葬受到了古希腊文化的影响,可能源于亚历山大大帝的东征〔7〕。

此外,约公元三世纪,在雅典地区附近的墓葬中出土一件下颌托,在长条形的金下颌托外附加有覆嘴罩(图一四,6),应与当地文化中使用唇盖的传统相关〔8〕。

五 中国境内出土下颌托的发展与演变

通过前文对东西方下颌托梳理,可以基本了解到下颌托这一丧葬用具在中国境内外起源、传播与发展演变等情况,在此基础上可初步勾勒出一条下颌托在中国流传演变的脉络。

〔1〕 宋馨:《中国境内金属下颌托的源流与演变——兼谈下颌托与流寓中国粟特人的关系》,《粟特人在中国——考古发现与出土文献的新印证》,513页,科学出版社,2016年。

〔2〕 Arnold von Salis, *Antiker Bestattungsbrauch*, *Museum Helveticum* 14, 1957.

〔3〕 武敏:《从出土文物看唐代以前新疆纺织业的发展》,《西域研究》1996年第2期。

〔4〕 林梅村:《古道西风——考古新发现所见中西文化交流》,378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

〔5〕 林梅村:《古道西风——考古新发现所见中西文化交流·自序》,1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

〔6〕 余太山主编:《内陆欧亚古代史研究》,228页,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

〔7〕 宋馨:《中国境内金属下颌托的源流与演变——兼谈下颌托与流寓中国粟特人的关系》,《粟特人在中国——考古发现与出土文献的新印证》,514页,科学出版社,2016年。

〔8〕 Arnold von Salis, *Antiker Bestattungsbrauch*, *Museum Helveticum* 14, 1957.

公元前十七至前十五世纪,具有原始形态的下颌托已经出现在中国新疆,这种习俗的出现,可能受到西来文化的影响。此后下颌托在新疆地区延续使用至公元前八世纪。这个时期使用下颌托者的性别、年龄、社会地位并无明显区别,男女老少均有,身份等级不明显。

在约公元前一世纪,由于受到更多的西来文化的影响与刺激,新疆地区的下颌托进一步得到发展,其形制得到改造和发展,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托部的出现;二是托部中间开口(托部为两条绢带);三是下颌托开始与额带组合使用(额带上多贴金箔或缝缀金属片饰)。之后,下颌托在新疆地区延续使用至约公元四世纪。使用者的性别、身份和社会地位区别不明显,表明这一习俗在当地流程度较高。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汉晋时期中原文化的诸多因素也西传到新疆,出现了西来的下颌托与东来的覆面、含塞物融为一体混合使用的新的文化现象。

公元四世纪末至五世纪末,受中亚金属工艺和新疆地区下颌托传统的影响,北魏平城及邻近的伊和淖尔墓葬中出现下颌托与额带组合使用的情况。这一次文化传播带给下颌托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此后的下颌托不再使用纺织品制成,而是使用金属制作;其二,下颌托与额带连接为一体组合使用的情形广泛出现。随着北魏迁都洛阳,在两京地区开始出现了下颌托,使用者大部分为女性,其身份多为北魏鲜卑贵族。

由于固原地区下颌托使用者自身经历与文化背景,加之固原作为中亚、西域与北魏平城和中原地区文化交流的中转站,在隋末唐初时,此地区出现了具有波斯萨珊王冠特征的额带,并且与下颌托连接为一体组合使用,开启了此后下颌托与头冠组合使用的先声。

唐以后,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扩展,下颌托向社会各个阶层扩散,并且与代表中国元素的冠饰相结合。其中唐初至盛唐时期,在两京、郾县等地区女性墓主佩戴与繁复华丽头冠组合使用的下颌托,使用者自身与其家族身份高贵,或是其夫为王室贵族和高级官员,或是墓主多与拓跋鲜卑存在亲缘血缘关系,可以明显看到北朝以来受鲜卑高级贵族丧葬习俗影响的遗绪。

至中晚唐时期,中国境内使用下颌托的风气逐渐从高级贵族官吏传播到社会中下层官吏,下颌托不仅出现在洛阳和偃师一带,随着安史之乱北人南迁,在三峡地区和广州等长江、珠江流域也有所发现。这一时期的下颌托较普遍地与冠饰组合使用,使用者多为女性。同时,在中晚唐时期三峡地区的少数墓葬中出现了单独使用下颌托而不与冠饰相配的情况,类似早期新疆出土者。这种个别“复古”现象出现的原因还有待进一步探讨,推测是否有可能系经由南北朝以来形成的“青海道”和长江水道直接从西域经益州(成都)传播而来。

中国境内最晚的下颌托延续到辽早期至明代,在通辽、三峡及长江中下游等地区均有考古发现,延续了此前使用与冠帽组合的下颌托的习俗。使用者多系女性,下颌托原始的保护遗骨完整的寓意已大大弱化,而更多地成为固定冠饰的附属之物,装饰意味大为强化。

综上所述,可将中国境内下颌托出现和发展演变的基本脉络划分为四个阶段,其中有关下颌托的分布地区、时代、使用者性别、下颌托的形制与质地等具体情况可以归纳为表一所示。

表一 我国境内下颌托发展演变的四个阶段

分布地区	时代	使用者性别	形制	质地
新疆地区	公元前十七至前八世纪	男、女	下颌托单独使用	纺织品
新疆地区	公元前一至三世纪	男、女	额带与下颌托分离使用	纺织品
大同与固原	公元四世纪至唐初	多数为女性	额带与下颌托连为一体	金属
内地	唐至明	多数为女性	头冠(头饰)与下颌托连为一体	金属

六 中国境内出土下颌托的性质

有学者曾对下颌托下过一个定义,是指“一种固定死者下颌,避免面部嚼肌因死后松弛而造成下颌下落,口部大张的特别器物”〔1〕。学术界多数学者认同这种观点,而且认为中国境内下颌托的性质与作用就是如此。通过前文对材料的梳理与讨论,我们认为中国境内下颌托的性质与作用不能一概归为“固定死者下颌”,因而有必要就此问题加以讨论。

通过前文所论可以发现,中国境内的下颌托在各个时段与各个地区之间存在差异,可以归纳为两个系统,一个是新疆,另一个是内地。两地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地区的文化传统、下颌托的质地、形制以及使用者性别等方面。两地区所表现的特征具体有以下几方面。

新疆地区下颌托起源甚早,目前我国境内所见最早的下颌托即发现于此地区,作为起源地的新疆自古以来处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干道上,也是汉唐丝绸之路的要冲,具有接受外来文化影响率先使用下颌托的文化土壤。目前在新疆地区考古发掘出土的下颌托均为纺织品,这是区别于内地下颌托的主要标志,体现出这一区域自身的文化特点。新疆地区下颌托后期由于受外来文化影响,形制和功能基本上与国外出土的下颌托相同,如主要用途在于保护死者下颌与头骨的完整、额带与下颌托分离使用等。另外,新疆地区下颌托的使用者并无性别限制,男女均可使用。

内地的下颌托也是接受中外文化交流的产物,并非中原文化传统。下颌托在内地出现之后,其质地与形制发生了改变,下颌托不再沿袭新疆地区用纺织品制作的传统,转而使用金属制作,且下颌托与额带和冠饰相连为一体,组合起来使用,成为死者头部整体葬具的一个构件,使用者基本为女性,下颌托表面饰有花纹,强调其装饰性。

以上这些差异使得我国的下颌托存在两种不同的性质与作用。新疆地区使用下颌托的死者,在丧葬观念和思想意识上或与西方文化相似,保留了固定死者下颌这一具有本质意义的文化内涵和功能。而内地从一开始更为重视下颌托所具有的装饰性功能,在对外来新鲜事物好奇心的驱动下接受并使用下颌托,使用者并不过分关注其原有的文化内涵,而是在加以改造后,逐渐使之成为繁复华丽冠饰的构件,成为死者头部装饰品的一部分,所以使用者多为女性。

〔1〕 宋馨:《中国境内金属下颌托的源流与演变——兼谈下颌托与流寓中国粟特人的关系》,《粟特人在中国——考古发现与出土文献的新印证》,501、502页,科学出版社,2016年。

这里不妨再观察内地出土的下颌托与冠帽之间的关系。首先,内地发现的下颌托与额带或冠帽相连为一整体,其系带方式基本有三种。一是“V”形系带,二是系带分叉,三是系带两端有穿(环)。系带较短,无法在头顶打结,显然这样做的目的并非是固定下颌所用,而是更多的服从于与额带冠饰等物相连的需要。其次,根据前文所论,可知在初唐和盛唐时期的墓葬中,女性墓主头戴繁复厚重的头冠,固定这些头冠必然需要较坚固的金属物体,将外来的下颌托与传统的冠饰有机结合在一起,不失为一种两者兼顾的最佳选择。最后,从目前考古发掘出土的情况看,下颌托作为死者的专用葬具,均出土于墓葬当中,由于下葬时人体平躺在棺椁内或棺床上,人体姿态从直立转变为平躺,使得戴在头部的厚重的头冠重心后倾,多有脱落的可能,需要坚固的物体将之紧紧固定在头部,而下颌托的出现,正好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便利。它可以紧扣下颌使得受力点前移至下颌,平衡头冠后倾之力,加之其金属质地和宽大的托部,能够更好地固定头冠。因此,内地发现的下颌托功能与内涵在其不断中国化的过程中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绝非只是一种固定死者下颌骨的葬具,其装饰性超出其在西方和初传新疆一带时的原始意味,也不能将其简单地限定在某一民族或某一宗教的信仰体系之内来加以考虑。

七 余 论

下颌托的族属与其体现的宗教信仰等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问题,最早有学者提出下颌托是受祆教文化影响,从祭司口罩转化而来的,是祆教文化遗物。之后还有学者认为下颌托与萨满教灵魂观念有关。我们认为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证据来验证这种关系的存在。从目前中国境内发现最早的下颌托来看,其保护死者遗骨完整性的特点十分突出。如前举若羌小河墓地 M34 中,除了墓主使用原始的下颌托将头颅的颧骨与下颌、下颌至头顶用毛线拴联固定之外,墓主尸体还用人骨的头颅、两臂和木制的躯干、下肢组合而成,且同墓地的另一具尸体完全为木质〔1〕,可见其目的是保证死者的尸骨完整。

前文中曾提及,营盘墓地和尼雅墓地中佩戴下颌托者也同时使用鼻塞和覆面,与中原传统的丧葬习俗相似。营盘墓地 M15 出土绘有五官的麻质面具,与此相似的面具早在埃及古王国时期出现雏形,并在中王国时期基本形成,面具多由木材和亚麻布构成,其上绘有面目,覆盖到胸部〔2〕,尼雅墓地出土的覆面与此相似,从面部延伸到胸部。近年来喜马拉雅地带出土了数件黄金面具,多缝缀在织物上,时代在公元前一世纪至公元六世纪,有学者已注意到此地区“与新疆和南亚次大陆联系非常密切,又通过新疆与中原、中亚和欧亚草原存在互动和交流”〔3〕。下颌托包括与之组合使用的覆面、面具等,反映了秦汉以来欧亚大陆之间及各自内部在丧葬礼

〔1〕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罗布泊小河墓地 2003 年发掘简报》,《文物》2007 年第 10 期。

〔2〕 刘文鹏:《埃及考古学》,204、205 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年。

〔3〕 全涛、李林辉:《欧亚视野内的喜马拉雅黄金面具》,《考古》2015 年第 2 期。

俗,尤其是面部丧葬物品方面存在频繁而又复杂的文化互动和交流,至少目前很难将其限定在某单一民族、宗教或仪式中来认识。在其背后,应既隐有中西文化交流的诸多因素,也存在着中国古代传统丧葬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与改造等多方面背景,需要我们更深入地研究。

附记:本文得到四川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名称:“中国境内出土下颌托的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2018YJSY029)资助。

A PRELIMINARY DISCUSSION ON THE LOWER JAW SUPPORTS UNEARTHED IN CHINA

by

Huo Wei and Pang Zheng

A lower jaw support is a very special funerary tool designed to prevent the deceased's lower jaw from breaking away from the skull. In China, the prototypes of lower jaw support were first discovered in Xinjiang. Under the influence of external cultures, the lower jaw support in Xinjiang had undertaken a series of significant changes in shape and burial concomitants. The use of lower jaw support in Xinjiang extended into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As cultur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went further, metal lower jaw supports started to be used in burials in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heartland areas, which is apparently the result of the spread of Xinjiang lower jaw support tradition and Central Asian metal craftsmanship. From the Northern Wei through the early Tang dynasty, the lower jaw support began to be used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brow-band. This gave rise to a new function of lower jaw support as headwear fastener. Such adaptive use of lower jaw support had continued into the Ming dynasty in the heartland areas, whilst in Xinjiang people proceeded with the original function of reinforcing the lower jaws of the tomb occupants. Driven by curiosity about exotic things, people living in heartland areas accepted the use of lower jaw support in burial practice and innovatively developed it as part of gorgeous head ornament. The rise of lower jaw support may come from the thought of keeping the corpse intact and indeed a western funerary tradition by origin, though no one can tell exactly which nations or religions it had first belonged to.

责任编辑:杨毅